

中国

新文学大系

1949-1976 第九集 散文卷 1

主编 袁 鹰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国

新文学大系

1949—1976

第九集

本书编辑委员会编

CHINESE NEW LITERATURE SERIES, 1949—1976

In 20 volumes

VOLUME IX: PROSE—Part I

Editor-In-Chief: Yuan Ying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7

Shanghai, China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49—1976

第九集 散文卷一

主编 袁 鹰

编辑：本书编辑委员会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发行（上海绍兴路74号）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3.875 插页 6 字数 652,000

1997年11月第1版 199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5321-1532-1/I·1218

定价：38.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厂质量科联系。T：56628900×13

序

袁鹰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四辑所选作品时限，上起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之日，下迄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年大动乱结束之时。这二十七年恰是本世纪的第三个四分之一年代，无论对于血火中诞生、风雨里成长的新中国，对于走过初显辉煌的三十年开始迈进新里程的新文学运动，都是极不寻常的时期，经历过一个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年代。笔者受任编辑这一辑的《散文卷》，起初时很有点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及至陆续拜读二十多年中上千篇作品、并且从中选编三百余篇的过程中，不由得时时经受忽起忽伏的感情波澜：分明很熟悉却已恍如隔世，似乎很亲切却又满眼沧桑，时时涌出万语千言却不知从何说起，真正是五味俱陈，百感交集。

冷静下来回头看一看，这二十多年的散文走过一条时而平坦时而崎岖，时而明亮时而黯淡的道路，也记下了本世纪中叶那迅猛又蹒跚的脚印，留下跋涉者、垦荒者、开拓者们的汗水、泪水和血水。若要粗略勾划，大体可以看出这样的轮廓：前八年（一九四九——一九五七），天翻地覆，百废俱兴，蓬蓬勃勃，万马奔腾；中九年（一九五七——一九六六），步履艰难，气氛郁闷，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后十年（一九六六——一九七六），飞沙走石，日月无光，风霜雷电，迷乱颠狂。从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那一天起，直到七十年代中期，翻滚不停的时代风云，冷热不定的政治气候，躁动不安的人情世态，不可避免地都在这一时期的文学艺

术特别是散文中得到反映,不反映是不可能的,不同的只是有时鲜明、有时隐晦,有时显露、有时曲折,有时直抒胸臆、有时委婉含蓄罢了。

中国由一九四九年十月起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个历史时期中最重大的最突出的标志,便是中国共产党在长年奋斗领导人民夺取革命的伟大胜利之后,作为执政党,它的无可挑战的崇高地位和绝对权威,它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以及各项政策包括文艺政策,就理所当然、毋庸置疑地成为文学艺术事业的指针。处于执政党权威地位的光辉和正确,必然强有力地促进文艺的繁荣和发展,使它达到空前的广度和高度;同样,执政党指导思想和政策的失误,也一定会产生限制、阻碍的负面效果,那影响也是既深且远,几乎少有例外。而这些又无不与作家的思想、情绪、心态千丝万缕,息息相关,自然地流泻到他们的笔下。政治如此直接而有力地作用于文艺,文艺又如此明确地将“为政治服务”大书特书标明在自己的旗帜上,是“五四”新文学运动诞生以来前所未有的现象。以后数十年的许多进进退退、是是非非、风风雨雨、恩恩怨怨,几乎都与此有关,由此而起,想避开也是不可能的。一九四九年十月开始的二十七年来散文,正是在与过去三十年完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迈出自己的脚步。

如今,中年以上的人回想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年代,总止不住悠然神往,沉醉于美好的记忆中,抚今追昔,不免浮起一阵“十万春华如梦”的惋惜,也会暂时抛却某些容易引起苦涩辛酸的往事,为那一段“黄金时代”由衷赞叹。“黄金时代”是具有感情色彩的形容词,并非科学的诠释,它出现在今天人们的用语中,当然带有强烈的针对性。但我们不能不承认它曾是不争的事实。最初,它们也是那样自然顺畅地走进老一辈作家的散文中的。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新中国成立刚刚两个月,旅居美国的老舍毅然远渡重洋,辗转回到祖国。在天津塘沽港登岸时,他情不自禁地感叹:

“在短短两天里,我已感到天津已非旧的天津,因为中国已非旧时的中国。更有滋味的是未到新中国的新天津之前,我看见了那渐变

为法西斯的美国,彷徨歧路的菲列宾,被军事占领的日本与殖民地的香港。从三藩市到天津,即是从法西斯到新民主主义,中间夹着这二者所激起的浪潮与冲突。我高兴回到祖国来,祖国已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是崭新的、必能领导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走向光明、和平、自由与幸福的路途上去的伟大力量!”(《由三藩市到天津》)

他写下个人一段旅途经历与感受,也代表了当时一代文人由旧社会迈入新社会的共同心声。那时候,新中国这个初生的宁馨儿刚刚跨出脚步,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在满目疮痍的土地上着手清除废墟积垢,建造新的家园。从北国到南疆,从东海到西陲,到处阳光灿灿、热浪腾腾,吸引着、呼唤着一切爱国的、要求进步、向往革命的作家们。他们抖落战火洒下的烟尘,拭去旧时代残存的污垢,响应党和领袖的号召,纷纷走出书斋,告别旧我,怀着满腔政治热情,走向自己过去并不熟悉甚至从未接触的工厂、矿山、农村、军营、战场和工业、水利建设工地。“深入生活”、“向工农兵学习”,一时成为广泛的自觉的行动,作家们以这项行动作为进入新时期学习、生活和创作的第一课,为之倾注了全部真挚的心意和感情,并且写出了五十年代初期第一批与过去迥不相同、从内容到形式都洋溢新气息的散文。读者欣喜地感到:新中国使作家得到解放,作家手中的笔也得到解放,完全进入一个新的天地。

我们感到十分庆幸的是,经过长年战乱流离,许多“五四”时期的老一辈作家依然健在,三十年代左翼作家们刚刚进入中年,他们担当起率领文学新军的重任。新中国初期的散文文苑,正是以他们作为主力军营造起来的。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冰心、郑振铎、夏衍、老舍、巴金、冯雪峰、丁玲、曹靖华、胡风、阿英、李健吾、王西彦、陈残云、何其芳、孙犁、李广田、吴伯箫、唐弢、柯灵、靳以……这一连串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闪光名字以及他们的作品,铺下了五十年代散文的第一批坚实基石。

二十世纪刚刚迈入下半世纪,爆发了举世瞩目的朝鲜战争。中国人民在创伤未复、百废待举的形势下,毅然承担重大牺牲,派出自己的优秀儿女投入这场反侵略战争。作家们又一次勃发出才过去不久的抗御强暴的壮志豪情,奔向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邻邦,用笔参加战斗。

比起抗日烽火中慷慨悲歌、挽救危亡的悲壮情绪,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更多腾越着英雄主义、乐观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如同战争年代那些脍炙人口的名篇一样,散文在这里又一次发挥了鼓舞士气、激励人心的特殊魅力。巴金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年青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些吧》、靳以的《站在杨根思烈士碑前》等文,为一代代读者传诵,至今仍堪称典范,时隔几十年后,读来依然激发起阵阵壮美的情怀。

也许是建国初期蓬勃兴旺、繁花盛开的良辰美景太吸引人了,也许是作家本人下笔之前有意避开个人情愫的抒写,以免被人目为“小资产阶级情调”(这顶帽子现在看来算不得什么,轻飘飘软绵绵的,在四十年前却足以使人手足无措、寝食难安)。构成五十年代前期散文特点的,多数都是描述新中国新人新气象的叙事纪实体裁,写作者在新的天地中的所见所闻所赞所佩所憎所喜。作家们倾注了自己的真诚的爱憎,使作品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除上文提到的来自抗美援朝战场的篇章,我们还可以举出冰心的《我们把春天吵醒了》、艾芜的《屋里的春天》、丁玲的《记游桃花坪》、白朗的《英雄的时代》、谢挺宇的《矿山上的人们》、冯至的《莫斯科》、赵树理的《一张临别的照片》、秦兆阳的《王永淮》和《老羊工》、宋之的《草地颂歌》、李若冰的《在柴达木盆地》以及其它许多作品。天津工人作家阿风的作品更使我们感到生产第一线的劳动者登上文坛的青春信息。这批纪实性散文中,有的同当时报纸上常见的特写体裁和六十年代初的报告文学靠近,含有明显的新闻因素。虽然它们都具有新中国初期散文的时代特色和艺术光彩,称之为当代散文名篇亦无愧色,但我们还是尊重徐迟先生的意见,将其中一部分移入他主编的《报告文学卷》中去。在这一辑《大系》中,《报告文学卷》、《杂文卷》和《散文卷》三卷毗连而居,是亲密友爱的邻居,我们三家本来就是常来常往,互通有无,互相依傍的。

然而,谁也不曾料到,建国刚刚五年,就发生了“胡风事件”,动荡的春风中冒出一阵萧瑟的寒气,砭人肌骨。那是建国初期第一次伤害文

人元气的“文字狱”，直接间接株连了一大批作家，其中不乏散文高手。胡风先生本人，在开国大典的锣鼓声尚在震响的十月，就接连写了两篇纪念鲁迅的散文《鲁迅还在活着》和《不死的青春》，成为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初的一批散文作品之一。“胡风事件”从文艺思想的分歧、争论、批判、迅速升级，终于构成定性的“反革命集团”的大案，使许多人为之震愕、震骇、目瞪口呆。那后果，不仅使一批文人身陷囹圄二十余年，等闲白了少年头，失去宝贵的青春岁月；影响所及，使更多厕身文字工作的人从此执笔为文，甚至执笔写信时都不免心存顾忌，不敢随意直抒胸臆，更不敢妄论是非了。其实，在此以前，文艺界已经掀起过两三次风浪，只是没有形成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罢了。对小说及据以改编为电影《我们夫妇之间》的批评，使一位有才华的青年作家萧也牧从此湮没文坛，也使所谓“小资产阶级情调”更加成为写作的雷区，不敢去碰一碰。对电影《武训传》的大张挞伐，使人们第一次领略文艺上的问题可以上到那么高的纲，可以戴上那么吓人的帽子。这类罪名，对文学艺术创作包括散文在内的影响，既深且远，多年不绝。就在“胡风事件”前不久，还开展了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首当其冲的俞平伯先生，本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散文名家，作品脍炙人口，建国以后，潜心于古典文学研究，经此一击，彻底丢下如花的文笔，从此，我们还能到哪里去欣赏《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陶然亭的雪》、《西湖的六月十八夜》、《清河坊》那样优雅隽永的美文呢？

散文以徘徊趑趄的步子走到五十年代中期，进入又一个振兴期，那就不能不推当时报纸副刊和文学刊物倡导之功。“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优良传统之一，便是报纸副刊大量地经常地刊载包括社会杂感、抒情小品、游记、读书随笔、书简、日记等各类体裁的散文，它们成为副刊上的主要品种，副刊也成了发表散文的主要阵地。新文学运动的半个多世纪中，一辈辈散文家大都是从报纸副刊走向社会，走上文坛的。这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传统，在解放初也还存在一段时期。《人民日报》有《人民文艺》和《人民园地》，发表散文、诗歌和连载小说。上海、南京等地的一些报纸也都保持副刊，上海还曾有由黄裳先生

《杂文复兴》一文引起一次规模不大影响却不小的讨论,冯雪峰先生也写过一篇总结性的《谈谈杂文》长文。可惜其后几年,这一传统一度中断,报纸也跟着“一边倒”,强调学习苏联办报经验,取消了副刊,而缺少副刊的报纸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自然不能持久。一九五六年中,由《人民日报》开始,许多报纸纷纷恢复或开办了副刊,这个措施受到作者和读者的欢迎。更重要的,是那年上半年颁布了发展科学和文艺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这个大气候,和风拂拂,细雨绵绵,随风入夜,润物无声,报纸副刊和文学杂志又准备了土壤适宜的园地,于是迎来了散文新的振兴景象,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出现了一个花团锦簇、五彩缤纷的局面。最明显最突出的标志,是作者队伍和写作题材的扩大。不仅“五四”老将、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主力军,解放后分别走上各种行政领导岗位,或者从事繁重的教学工作,他们在公务教务之余,仍未放下散文的笔。夏衍、柯灵、黄药眠、钟敬文、何其芳、秦牧、刘白羽、许钦文、陈残云、杨朔、方纪等人的文章,几乎都是忙里偷闲写出来的。我们欣喜地读到小说家、诗人、翻译家、文艺评论家、戏剧家、美术家和新闻家如周立波、陈学昭、赵树理、碧野、萧乾、艾青、臧克家、田间、曹禺、黄秋耘、杜宣、叶君健、徐迟、吴祖光、黄苗子、邓拓、吴晗等人加入散文队伍,也欣喜地看到一些解放后由于种种因由辍笔的作家如沈从文、张恨水、周瘦鹃等也纷纷露面。更使人高兴的是大批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青年散文家崭露头角,大步走上文坛,有的已有十年八年写作经历,有的刚刚脱颖而出。今天已渐渐步入中年和老年并已为读者所熟知的冯牧、黄裳、魏巍、郭风、凤子、柯蓝、魏钢焰、艾煊、何为、徐开垒、黄宗江、菡子、宗璞、李若冰、白桦、韩少华……当时即已成为散文园地的佼佼者。他们都以各自具有特色的作品为繁花盛开的园圃增添了一簇簇带着朝露的香葩,展现了建国后散文又一次繁荣绚丽。

不幸的是,绚丽的彩霞转瞬随风而去,明朗的晴天倏然阴霾密布。五十年代中,经济建设战线捷报频传的同时,政治运动几乎同步也频繁兴起,并且越来越显露严厉冷峻的神色,远远超出文学批评、思想交锋的范畴。对中国文人来说,除去极少数曾在抗日根据地的延安参加过

“整风运动”留下毕生难忘的印象以外，绝大多数人何曾见过这样的阵势？片言只语便遭谴责，信件日记也成罪证。天真善良的作家们，由茫茫然惶惶然终至惴惴然不安了。到了一九五七年夏季，全国范围内的突然掀起“反右派”风暴，使知识分子、文化人遭到解放后第一次大规模五雷轰顶的打击。他们谁也不会想到写一篇短文章、一首诗、在座谈会小组会上发一次言，提几条意见，或者连这些也没有，只是平时几封书信、几句闲谈，突然全构成大罪。顷刻之间，变生肘腋、祸起萧墙，等他们蓦然想起过去只是从史书上见到听到的“文字狱”，已经不由自主地身陷罗网，被迫放下了笔。然后就是打入另册，扫地出门，抛家别友，流徙江湖，二十多年的黯淡岁月。这一场后来被人们痛苦地称作“丁酉之难”的政治运动，给当代文学事业造成的最大最直接的损失，是摧残了一大批忠诚正直、满腹才华的英才俊彦，使他们在远山僻野农场林场的颠沛流离中蹉跎岁月，报国无门，请缨无路，青春岁月和锦绣才华，都付与荒烟衰草。待到二十多年后“改正”归来，都已等闲白了少年头，只剩得一身瘦骨，一腔幽愤。还有不少等不到改正的一天，早已沦为异乡孤鬼了。刚刚出现振兴气象的散文，同整个文学艺术事业的命运一样，第一次受到雨打风吹，伤筋动骨。在劫难逃，个人是无能为力的。

从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中期的八九年间，散文有过几度兴衰，同样不可分离地是以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起落为依归的。狂热浮躁的连续“大跃进”，燃烧起一阵阵虚火，也鼓动起作家们的政治激情和创作激情。那一时期，散文和诗歌特别兴旺，作家们、诗人们（包括成千上万的业余作者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大胆幻想，纵情讴歌，仿佛天堂般的生活触手可及，憧憬多年的美好理想明天就会在身边实现。那一时期，热烈的浪漫主义太多太多，冷静的现实主义太少太少。等到在严酷的现实南墙前碰了壁，付出沉重又沉痛的代价换来一些清醒，灾难已经像大山一样压下来了。

散文在这样严峻的时刻显示了自己的品格和力量。五十年代末到

六十年代初期,陆续出现一批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如陶铸的《松树的风格》、郑振铎的《移山填海话厦门》、冰心的《再到青龙桥去》、刘白羽的《红玛瑙》、《长江三日》、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韦君宜的《忆西榆林》、方纪的《挥手之间》、陈残云的《沙田水秀》、曹靖华的《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杨朔的《荔枝蜜》、《雪浪花》、碧野的《雪路云程》、徐迟的《祁连山下》、林遐的《阳光满院》、峻青的《秋色赋》、魏钢焰的《船夫曲》、李广田的《花潮》、黄钢的《拉萨早上八点钟》等篇(这里提到的一部分作品另移入《报告文学卷》——编者注)。它们有个共同的或相近的特点:赞美不畏强暴,不怕困难、艰苦卓绝,昂扬向上的民族精神和民族风骨,从现实生活和群众的精神世界中寻求美好的精髓和境界。比起前两年那些风风火火、锣鼓喧天的文章,显得充实、凝重、浑厚、质朴得多了。以它们为代表的那一大批作品,曾经发挥过重大的影响。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政治气候中,确实对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产生一种鼓舞意志、纯净心灵的精神力量。对当代散文的发展和提高,它们也处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位置上。对青年散文爱好者的启迪垂范意义,更加明显,而且经久不衰,直到如今,有相当部分的佳作还年年在语文课本与大中学生为伴,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

前些年曾风行过一种议论,对五六十年代的一些散文名作有过分责备,乃至简单地加以否定,理由是它们有意无意地用虚情假意和美丽辞藻掩饰了当时经济困难、物资匮乏和生活贫困的严峻现实,没有揭示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人祸,丢弃了文学应该真实地、本质地反映现实的责任,因而不免成为粉饰太平的工具。这种评价自然也言之成理,却多少有点离开历史也离开作家本人具体情况,窃以为不能算是十分公正和符合实际的。中年以上的人,都曾经历过那个时期的哀乐浮沉,全不是三言两语能简单地作出判断的。笔者本人由于多年做编辑工作,有幸结识许多前辈和同辈散文家,多少懂得些他们的心思,多少感受到他们的忧患和欣喜、希冀和追求,我绝不怀疑他们对祖国的忠诚、对人民的责任感和对生活的热爱,也不怀疑他们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和表现真、善、美。但是,由于主观和客观种种因素,他们的观察和叙

述不深刻、不准确乃至谬误，或者心存顾虑，有所回避，言不由衷，都是可能的。今天的评论家自然有随意评点指责的自由，笔者只希望今天的读者们对历史的是非曲直能采取冷静和宽容的态度，何况有些作者早已作古，有的在十年动乱中受尽迫害死于非命，我们怎能忍心要求他们对当时的虚夸、谰妄、劳民伤财承担更多的责任呢？

六十年代前期，经济上的调整方针，使绷得过紧的弦一度有所松弛，也使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连续三四年的紧张亢奋情绪稍稍有点冷却，从而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有识之士也才有可能对前几年的狂热浮躁开始作冷静的认真的思索。于是，制订了以调整放松为主旨的“文艺十条”，召开了以调整知识分子政策为主题的“广州会议”，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对文艺界起了一些拨乱反正的作用。尽管这些措施并没有也不大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多年来起主导作用的“左”的指导思想和许多政策，但是毕竟使紧张已极的气氛有所缓解，已成为惊弓之鸟的作家们还是有欢欣舒畅的感觉。文学艺术创作都出现一阵新的兴旺景象，散文也就涌动了建国后的第三度春潮。

作为这“第三度春潮”的标志之一，是一批在此以前比较罕见或者几乎不大可能问世的抒情散文、随笔小品陆续出现。比如《访沈园》（郭沫若）、《阿咪》（丰子恺）、《或人日记抄》（李广田）、《马缨花》和《夹竹桃》（季羨林）、《虞山春》（黄裳）、《碧螺春汛》（艾煊）、《西湖漫笔》（宗璞）、《张献忠不杀人辩》（孟超）、《郑板桥的两封家书》（廖沫沙）、《小闹闹》（邵燕祥）这一类作品，能设想出现于三五年前吗？那个时候，有哪一家报刊若是不小心漏出一件两件这样的稿件，轻则会遭到“小资产阶级情调”、“闲情逸致”、“宣扬人性论”之类的指责批评，重则就戴上“影射现实”、“将工农兵读者带向何处”、“挖社会主义墙脚”的大帽子，作者和编者受到无尽无休的纠缠和追查，直弄得停刊检查，也未可知。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而且即在当时，《阿咪》、《小闹闹》等文在上海发表后，就已冒出一些冷言冷语，更不用说“文革”年代难逃“毒草”的恶谥了。

这样的短暂春光并没有延续多久。“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来又归去。”一九六二年秋天以后，阶级斗争的弦重又绷紧，叫做“念念不

忘”，而且又传来一道“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那令人不寒而栗的符咒。小说尚且可反党，则直抒胸臆的散文随笔杂文岂非更不在话下！作家们的头顶上时时刻刻悬着的那柄摩达克利斯之剑又在挥舞，脑子里划下的十道百道禁区又渐渐凸现，谁还能安详地从容地执笔？二十年后，人们苦涩地回首那一段经历，有人说那时“下笔如有鬼”，有人则说是“下笔如有绳”。鬼也罢，绳也罢，反正绝不是“下笔有神”。笔下无神，失却挥洒自如的自由，也就失却真诚地反映现实，直面人生的勇气。天长日久，头脑里禁锢越来越多，枷锁越来越重，有的是别人强加上的，有的是自己主动戴上的。不过，那时文坛气氛虽是紧张严峻，写作道路虽是狭窄险仄，有心人依然可以找到一块稍稍宽松的小天地和用以表达自己心曲的形式。那些素来以忧国忧民为己任的正直的作者们，总有满腹肺腑之言要倾诉，有满腔激愤之情要宣泄，有动乎中，自然就要形诸文字，于是就用随笔小品、读书笔记以至游记来作曲折的表达，形成了六十年代中散文文苑中一个鲜明而又独特的现象。这里选了一部份，还有不少估计已由罗竹风先生收入他主编的《杂文卷》中去。

中国现代文学史家无法避开以最严厉、最沉重的词句叙述那黑色的十年，即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到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实质上亦即大革文化命、大革文人命的十年，或者再加前此所谓“序幕”，约有十二年左右。回想起来，那一场旷世罕见的浩劫，并非如自然界的冰雹、洪水、山崩、地震等等灾难那样突如其来，猝不及防，而是早有先兆。对文艺界来说，更是势有必然。前文所述的一度春光，到了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已渐渐演变为时晴时阴时风时雨，渐至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作家们痛苦地发现自己手中的笔越来越枯涩，天地越来越小，道路越来越狭，说不定哪天早晨，也并非由于自己的原因，随时能遭到呵责。文坛上总有那么几双眼睛在一个角落里时刻窥伺，念念有词；也总有那么几根鞭子忽隐忽现，嘶嘶作响，只待时机一到，就会肆无忌惮地大显身手的。

一九六六年，“文革”狂飚终于自天而降，骤然间是非黑白都颠三倒

四。正确被指斥为谬误，善良被目为犯罪，革命被诬为反革命，一切都被破坏，被毁灭，被投入火海，化成灰烬，遑论什么文化，又遑论什么散文！如同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一样，首先被开刀祭旗的，仍是手无寸铁、只有一支旧笔的文人。吴晗写于六十年代初期的历史剧《海瑞罢官》、邓拓写于同时期的杂文随笔《燕山夜话》以及他们两位与廖沫沙合写的杂文随笔《三家村札记》成为第一批祭品，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大厦崩倾，茫茫一片。功勋煊赫的开国元勋，百战沙场的老帅老将，为建国大业呕心沥血的治世良才，一个个全被打翻在地，沦为阶下囚。至于素来处于挨整地位的文人，更是在劫难逃，几乎无一幸免，一齐陷入千古厄运。老舍、田汉、翦伯赞、邓拓、吴晗、陶铸、赵树理、李广田、丽尼、杨朔、韩北屏、闻捷……一大批优秀作家，都在十年劫难中先后死于非命。直到此刻撰写这篇序文，提到他们的名字，想起他们的音容笑貌，我仍然抑止不住阵阵欷歔，心中酸楚，祝愿他们的灵魂在天上得到安宁。

那十年中，作家们几乎人人失去执笔的权利，失去人身自由，处于有笔不能写、有口不敢言、家人不团圆、朋友不相聚的凄惨境地。即使如此，时时兴起大大小小的文字狱，还在继续不断增添新的株连者。到七十年代中期，曾传来最高领导人对江青一伙统治下的文艺界的不满和批评，所谓“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没有散文，没有文艺批评”，难得地给人们带来一些慰藉和苦笑，但已无济于事，只不过引起对那批炙手可热的奸佞们倒行逆施的控诉和憎恨，那时文坛已经满目凋零，只能在砍伐殆尽的废墟上作斜阳下的凭吊了。

不能说那十年中绝无可看的散文，然而，真如凤毛麟角。六十年代中叶以后，假大空的文风盛行。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装腔作势、堆砌词藻、内容空洞、言之无物的散文连篇累牍，影响语言文字的健康纯洁，败坏了读者的口胃，其恶劣的危害性至今未灭，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毒害到第二代、第三代的语文学习和文化素养。我们编选本卷时，想努力寻求几篇那十年中比较可读的篇章，委实为数很少，而且也不免残存一些当时文风的痕迹。

这里要欣慰地提到祖国大陆以外的同胞文友，即六十年代和七十

年代中一大批台湾和香港澳门作家们在散文创作上的成就。他们有的继承“五四”以来的文学传统(如台湾),有的在抗日战争前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进步文艺作者开辟的土地继续耕耘(如香港、澳门),那二三十年中,老作家和中青年作家纷纷拿出得意的作品,扩大和丰富了散文领域,无论就内容题材之广泛,形式风格之多样,都别开生面,自成格局。台湾由于一九四五年光复后有一批大陆去的老作家(如台静农、梁实秋、钱歌川等),或在台湾大学执教,或编杂志,弦歌不辍,笔耕不辍,同杨逵、钟理和等当地老作家以及后来陆续崛起的张秀亚、琦君、余光中、王鼎钧等中青年作家一起,为台湾几十年来的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人才辈出,佳作如林,创意构思,行文运笔,都使人耳目一新。只可惜由于数十年隔绝,我们现在能读到的台湾散文集还很少,未得一窥全豹,本卷所选作品是否都是各家代表作,更难判定,因而总感到深深遗憾,只能留待来日补偿了。香港处于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明的交汇点,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云谲波诡的经济浪潮,瞬息万变的信息交流,快速剧烈的生活节奏,必然多多少少地影响和促进文学的发展。老作家曹聚仁、李辉英、叶灵凤、曾敏之、吴其敏、刘以鬯、高旅等等带领一大批中青年散文作者,多年来支撑并促进了报纸副刊和杂志使散文、随笔、杂文、小品这类体裁的兴盛,点染了别样风光,成为香港文学大厦的一根不可少的支柱。所谓“文化沙漠”的论断,实是一种偏见。香港回归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它的文学的新繁荣期也是指日可待的。

祖国大陆上足以代表十年动乱后期文学的,只有一九七六年丙辰清明节天安门前的诗文了。素花如雪,悼词如云,慷慨悲歌,壮怀激烈,字字血泪,气壮山河,人民群众拍手欢呼,奔走传抄;魑魅魍魉惊惶失措,气急败坏。那震撼人心的壮烈情景,二十年后回想,依然令人神飞气旺。可惜作者们当时没有也不可能留下姓名,如今已无处寻访。第二年清明时,出现了好多种版本的“天安门革命诗文抄”,其中一本编者署名“童怀周”,寓共同缅怀周恩来之意。这些“佚名”的作品都是集体用血和泪写成的,作者就是那些坚持真理、忠诚于人民、不屈服于强暴

的战斗者。我们选了几篇,作为本卷的压卷之作,它们不仅宣告了旧时期的终结,也预示着新时期的来临。在当代散文园地里,这也是黎明前的晨曦,林中的响箭。它们诞生在阴霾密布、使人窒息的四月,仅仅半年以后,十月雷声震响,随着历史新时期的到来,将要显示本世纪最后辉煌的散文新时期便奏起动人心魄的序曲了。

一九九六年早春,北京

《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编辑委员会

顾 问 赵家璧 丁景唐

主 编 江曾培

副主编 郝铭鉴

编 委 左 泥 邢庆祥* 江曾培

郑 隍 郑宗培 郝铭鉴

(按姓氏笔画为序,*为本卷执行编委)

本卷责任编辑 修晓林

封 面 设 计 袁银昌

版 式 设 计 蒋福海